

摘 要

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在两个方面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巴金幼时对基督教的接触和在法国留学时对《圣经》的熟读，可以看作基督教对巴金影响的直接渠道。巴金对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的接触是基督教对巴金影响的间接渠道。巴金受到俄国的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俄国是东正教国家，这些社会思潮中蕴涵的基督精神也影响了巴金。巴金喜欢卢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巴金。）本文认为基督教对巴金的影响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 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是基督教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人为了精神的愉悦抛弃一切感性的，物质的欲望。（受东正教影响，俄国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就蕴涵着一定的禁欲主义因素。巴金接触过许多反映虚无主义者思想和斗争的著作。他的作品也间接受到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这表现在《灭亡》、《新生》、《海的梦》中，在杜大心、李冷和异国女郎的行动和思想中都能看出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痕迹。对爱与平等的呼唤使巴金推崇个性解放，而对基督教执着的献身精神的认同又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禁欲主义因素。）

二 爱与平等；基督教宣扬博爱思想，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人格平等的观念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的起源及其发展》中，赞扬了这种基督教的伦理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求建立“人的宗教”，仍然继承了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思想。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万人安乐，自由平等的社会。巴金在《火》第三部中引用《圣经》的话表现了这一社会理想。基督教的博爱是与人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传统礼教强调的爱有差等不同，基督教的博爱成为打破中国传统礼教的工具，而追求人格的平等必然带来个性的解放。这主要表现在《激流三部曲》中。）

三 信仰与牺牲；基督教不置重肉体而置重灵魂，特别推崇为信仰牺牲的殉道精神。（这在俄国革命者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巴金编译过大量俄国民粹主义者斗争的书籍，对他们为信仰牺牲一己的精神特别敬仰。这种精神在《福音书》里耶稣的故事中得

到升华，这主要表现在《爱情三部曲》中。而且，基督教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不同于传统的舍生取义。

四 罪感与忏悔；忏悔是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基督徒向上帝赎罪的一种形式。（受东正教影响，俄国民粹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向人民赎罪的意识。巴金在《灭亡》、《新生》中表达了出生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应该替家族向人民赎罪的思想。巴金的赎罪思想也受到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因为不能把无政府主义思想诉之于实践而忏悔，在《随想录》中，巴金的忏悔带有对国民性的反思。）

五 世界主义与民族情绪；基督教因信称义，博爱的对象是所有信教的人。（从基督教的影响看，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具有《启示录》性质，巴金也在作品中借启示录对美好世界的描述表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但《圣经》中的耶稣同样有民族感情。巴金在作品中用圣经故事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如《海的梦》、《“重进罗马”的精神》等。）

本文作者进一步指出，基督教对巴金的影响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巴金是无神论者，曾在文章中抨击、否定基督教，但基督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巴金对基督教的看取态度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看取态度：力图把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和宗教归化区分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重估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要救国救民，必须推翻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寻求一种新的能够拯救苦难民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巴金对基督精神的认同就源于这种重建价值体系的愿望。）

主题词：巴金 基督教 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

BAJIN AND CHRISTIANITY

Summary

Bajin is one of the great writer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ity influenced his thought and works in two ways. When he was a child, he got some touch with Christianity and had good impression of Bible. When he studied in France Bajin read avidly Bible. Bajin believed in Anarchy and was moved by the stories of Russian revolutionists. Because Russia is a Christian country, the social thoughts of this country have some Christian spirits. Bajin like reading the works of some great western writers such as Rousseau and their attitude about Christianity also affected Bajin.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to Bajin includes five points.

1 Asceticism Ascetic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moral, it ask people give up all perceptual and material appetite for the happy of spirit. Influenced of Christianity, Russian nihilism contains some asceticism factor. Bajin has touched many works about nihilist thought and struggle. His wrings are influenced by asceticism, which is represented in his works.

2 Philanthropy and Equality Christianity advocate philanthropy and everyone are equal in the front of God. The personal equality affects all western culture. Rousseau wanted to establish the religion of human. Anarchy wanted to establish the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has freedom and equality. Bajin recited the sentence of Bible to express his thought about philanthropy and equality. The equality of philanthropy is different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means one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um receives different love.

3 Belief and sacrifice Christianity regards spirit more important than body and has greatest esteem for martyrdom. This thought was expressed in the acts of Russian revolutionists that have great impression on Bajin. This kind of spirit sublimated by passion in Bible. Moreover, martyrdom for belief is different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that one should give up his life for moral.

4 Sin and Penitence Penitence is one of contents of Christian life, and a way of the westerns' introspection and purification. Russian revolutionists had the deep feeling of atoning to people. In his works, Bajin expresses the thought

that the young who are born in the classes should atone to people for their families. This thought is also derived from Rousseau and some Russian writers. He has atoned because he did not carry anarchism out and meditated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5 The Feeling about World and Nation To Christianity, the objects of philanthropy is all Christianizes.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the Utopia of anarchists is like the society in Apocalypse to some extent. Bajin used the sentence in Bible to express his social ideal. He used Biblical stories in his writings to inspire people's braveness of resisting Japanese.

The author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to Bajin is not a kind of linear relation. Bajin is an atheist. Though he denied and attacked Christianity in his wrings, Christian culture did affect his thought and works. The attitude of Bajin to Christianity is same as the attitude of the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to the religion. They all tried to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ultural spirit and religion naturalizatio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of May.4th is the revolution of revision of value. These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 felt that if they wanted to their country and her people, they must overthrow traditional moral principles and valuation and seek new one. The identification of Bajin with Christianity is derived from the their desire of rebuilding system of valuation.

Key Words: Bajin Christianity direct influence indirect influence

第一节 巴金与基督教研究综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巴金及其文艺创作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就国内的研究来说,巴金1929年走上文坛时,就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发表于1922年9月《文学旬刊》上记者给沛荪的信,是目前知道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刘西渭(李建吾)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青年巴金与众不同的思想与才华,对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给予很高的评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研究巴金的论著已经很多,如《巴金评传》(陈丹晨),《巴金民主时期的革命道路》(李存光),《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巴金论》(汪应果),《巴金论稿》(陈思和,李辉),《青年巴金及其文学世界》(艾晓明),《巴金研究资料》(李存光),《巴金年谱》(唐金海,张晓云),《巴金传》(徐开垒),《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思和),《作家巴金》(余思牧)等。在国外,巴金的思想 and 创作同样受到关注。巴金的作品被译为各多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汉学家明兴礼就发表了专著《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之后,又有《巴金和他的作品》(美国,奥尔格·朗)《巴金》(美国,内森·茅)等专著问世。这些研究专著或传记大都是从巴金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巴金所涉猎的中外文学,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着眼,分析巴金人格的发展,解读巴金作品,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不足之处在于,在如此多的专著中仅有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涉及到巴金与基督教的关系。而在国内的研究中,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巴金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对巴金创作道路和思想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被国内研究者忽略了。

事实上,基督教及其文化对巴金的思想 and 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巴金的创作和翻译看,他翻译的不少作品中提到过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圣经》中的话。如在《新生》中引用了《约翰福音》,在《光明·序》中引用了《路加福音》,在短篇小说《罪与罚》中引用了《出埃及记》,在《死去的太阳·序》引用了《申命记》等等。而近十年来国内探讨巴金与基督教关系的论文和著作的出现,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有关。到目前为止,不少学者撰文专门探讨了基督教文化与鲁迅、

周作人、曹禺、许地山等作家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基督教文化与巴金的关系,却很少有论者以专门的论述加以研究。目前巴金研究状况表明,注意到考察基督教文化与巴金关系的论著,只有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四节),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十二章)。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以巴金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对于基督教对巴金产生的直接影响论述比较充分,基本上没有涉及间接影响。两位国内学者都是在综述的基础上研究巴金与基督教关系,即首先归类出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产生影响的几种表现,把基督教对巴金的影响纳入其中的一类或几类。这样,就突出了巴金的思想 and 作品所受基督教影响的结果,而忽略了这种影响的来源。

我们认为,基督教通过两个渠道对巴金的思想 and 创作产生影响的。除了幼时对《圣经》的美好印象和在法国留学时对《圣经》的熟读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对巴金影响的直接渠道,基督教对巴金思想的形成和人格塑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巴金对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的接触发生的。俄国的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和三位西方文化伟人——卢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and 著作也对巴金接受基督精神起到间接的桥梁作用。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的分支东正教为正宗,俄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社会思潮和革命运动与这种宗教精神有一致之处。俄国的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带来的社会运动是影响巴金一生的主线,当巴金接受俄国的革命思想时,同样会感受到其中的基督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的巨匠式人物,卢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独树一帜地提出自己对基督教的想法,在各自的作品中对基督文化精神的某一部分进行强调,如卢梭对博爱的推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忏悔意识,而巴金对这三位文学巨人的思想 and 作品都非常熟悉,受到他们作品中基督精神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

在《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中,明兴礼对巴金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作为天主教徒的明兴礼认为:巴金在幼年时曾与母亲一起皈依了上帝——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随着巴金年龄的增长,这个上帝的观念在逐渐褪色。由于巴金的人道主义立场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观无法契合,他否认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意义的存在,他对福音的解释与列

夫·托尔斯泰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相似，并不是教会对福音的神学解释。《火》第三部中巴金笔下的田惠世并不是一个笃信上帝的基督徒。总之，巴金以人道主义代替了基督教，另外建立了一种革命的神秘学。这个“人类至上”¹的革命的神秘学和对于基督的信仰之间“隔着一道深渊”²。很明显，明兴礼是以正统天主教徒的身份，站在纯粹的宗教神学立场上解释巴金与基督教的关系。明兴礼说在《神、鬼、人·序》中，巴金略略显露了他的基督教信仰。这个说法需要进一步考证。第一，说巴金小时候信奉基督教并无多少实证材料。从目前知道的巴金回忆性文章看，我们只知道他的生母为了给女儿治病与教会医院的英国女医生有过往来，接受了女医生赠送的《圣经》。巴金很喜欢“那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当时并没有想过去读它”³。第二，在《神、鬼、人·序》中，我们很难看出巴金有过基督教信仰。本来《神、鬼、人》中的几篇小说就批驳有神论，序言不可能与正文有所抵触，而《神、鬼、人·序》中提到的“神”究竟是不是耶稣基督还很难说。我们只能说巴金幼时接触过基督教，不能断定巴金信仰过基督教。直到1927年，巴金在法国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及其发展》时“熟读了《圣经》”⁴，对《福音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因此，探讨基督教与巴金的关系，不应该从单纯的教义教规和福音出发，就宗教神学本身挖掘巴金所受的影响。重要的是应该探讨基督精神对巴金思想的影响，以及基督教文化对巴金作品的深层渗透。这也是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趋势。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下简称《十字架下的徘徊》）就是从这个角度观照巴金作品的。《十字架下的徘徊》是一部综论，它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影响和表现做了基本的梳理，其中谈到巴金。作者从两个方面对基督教与巴金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一是巴金在《火》第三部中塑造的田惠世形象，马佳认为巴金是按照写基督的笔墨来写田惠世的，田惠世身上表现了基督精神：容忍、牺牲、博爱、韧性的抗争和奋斗，“田惠世就是当时巴金心中的基督”⁵。二是巴金在小说《憩园》、《寒夜》中表现了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纯白的心”、“沸腾的热血”、“同情的眼泪”⁶是塑造巴金人格的三个基因，也是他天然接近神圣存在、博爱精神、牺牲勇气和忏悔意识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超越世俗的一面，巴金产生了强烈的宗教情绪。马佳的论述过于宏观，并没有深入分析在巴金思想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的无政府主义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而且根

据巴金成年后对幼时的回忆片段，认定巴金与基督精神有天然联系，证据并不充分。作家成年后往往用既定的世界观回顾往昔。而以《憩园》、《寒夜》为代表分析忏悔意识，不能全面表现巴金忏悔意识的发展和深化。在《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下简称《旷野的呼声》）中杨剑龙对巴金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的论述则比以上两位学者全面。他认为巴金虽然是一位无神论者，执著地抨击、否定基督教，但基督教仍对其思想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巴金身上有教徒般的救世献身精神。这种影响融进他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他批判社会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因素。杨剑龙同样把注意力集中在《火》第三部，他看到巴金批判了田惠世的基督教信仰，颂扬了田惠世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的两个方面，却没有深刻剖析巴金反对基督教信仰又热烈赞扬田惠世基督品格的内在原因。我们认为，实际上巴金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呈现出某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现代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上可谓一种代表。那就是反对基督教，热烈赞美、向往基督的人格力量，为了这种人格力量有时甚至动摇了自己的反宗教立场。在巴金那里具体表现为：在理论性文章中深刻抨击基督教，在小说和散文中多次赞美基督伟大的人格，描绘基督坚忍的毅力，引用《福音书》中富有比喻和象征意义的语言。田惠世是巴金创造出的一个十分独特的教徒形象。《火》第三部的创作意图仍然以抗战为主线，虽然巴金为了驳斥田惠世的宗教信仰，使他在丧子的打击下对“主”的教诲发生怀疑，但抗战的背景使读者的注意力更多集中于侵略者的暴行，并且，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田惠世的宗教思想合流，结果把田惠世的基督教信仰做了诗意的描述。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作者试图对巴金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第二节 基督教禁欲主义对巴金的影响

与二十世纪初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源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最早源于俄国的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5岁时，巴金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感到“里面全是自己想说清楚而没法说清楚的话，合理，雄辩，富有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自己的心烧成灰了”¹。《告青年》并没有什么理论色彩，克鲁泡特金向青年人指出社会制度的罪恶，鼓动青年人推翻旧社

会，建设“万人安乐”的新世界。这迎合了巴金改造社会的愿望，对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影响。巴金 16 岁那年，读到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度里的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夜未央》反映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艰苦斗争和牺牲精神，后来巴金曾多次重译这个剧本。从巴金的译著可以看出，他一生翻译、编写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小说和传记。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俄国的革命者为了下层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向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开战，毅然抛弃了财产、名誉、地位甚至爱情，他们的故事中充满了忧郁的气息和狂热的殉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国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比无政府主义理论更强烈地吸引了巴金。对于这个在黑暗中不见光明、孤独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方式就成为他的人生追求。

俄罗斯是基督教的东方分支——东正教国家。东正教基本的教义精神与基督教完全一致。基督教宣扬博爱，东正教教义也宣扬一种普遍的爱——爱上帝同时也爱他人。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在俄罗斯民族中非常盛行，赎罪的方法就是忏悔。基督教要求的禁欲主义，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为信仰而忍受痛苦和牺牲的精神，一直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之中。作为近、现代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思潮，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浸染了基督教的精神内涵。随着巴金对俄国近代社会思潮和运动认识的加深，蕴涵其中的基督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着影响，首先就是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基督教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虽然是有血有肉的躯体，但人的本质在于人分有上帝放在人身上的圣灵，肉体是囚禁灵魂的监狱。禁欲主义要求人们禁止自己的一切感性欲望，抛弃现世的一切物质享受，不去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的人才会得到灵魂的愉悦和超升。耶稣在登山训示中说：“决不要忧虑说，‘我要吃什么’或‘我要喝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异教徒所追求的东西。……你只需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求天父的国和天父前的义，其余的东西就会因此而得。”相传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就是受了《罗马书》中“应该服从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的训诫后皈依基督教的。俄国虚无主义思想中就蕴涵着一定的禁欲主义观念。

虚无主义是俄罗斯一场激进的思想革命，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思想。屠

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形象，就反映了虚无主义者的某些特征。斯捷普尼亚克在《地底下的俄罗斯》中说：“虚无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言以蔽之，绝对个人主义而已。凡所谓社会家族，乃至宗教所强迫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切义务责任的负担，它皆籍口个人的自由，对之一概否定。它不仅是对于政治的专制的反抗者，而且还是对于那束缚个人意志自由的道德的专制之最热烈，最有势力的反抗者。”

从发起这场思想变革的俄罗斯社会阶层看，从东正教学校出来的毕业生和教士子弟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虚无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拉赫美托夫刻意躺在铁钉床上，使自己能忍受苦难和磨练。著名的俄罗斯神学家布哈列夫在其中看到了东正教禁欲主义的特征。俄罗斯虚无主义否定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最高权威，与家庭和全部已确立的生活方式决裂，是对建立在黑暗和邪恶之上的世界的背离。统治，权力，传统道德由于对于人的奴役辩护而被认为是罪孽的。造成虚无主义思想的基础，正是东正教对现世世界的否定，对世界基于邪恶的感受，以及对生活中艺术与思想所有多余创造是罪孽的认识。与东正教禁欲主义相似，虚无主义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行动，但同样也倾向于反对丰富的创造力和个人的生活财富。“艺术因为被视作唯心论的表现之一种，遂遭虚无主义者的排斥，而且凡是以刺激起美感的一切事物都被他们所否认。”一个鞋匠比拉菲尔有用是他们的口号，所有力量却应该献给世界上的人类解放，把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是虚无主义者唯一的需求。更突出的是，信奉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俄罗斯人，会轻松地走向牺牲和苦难，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宣传自由，但对自己而言，却在任何时候却没有使用过任何自由——为的是想到自己是捍卫自由，不受私利的干扰……。

巴金受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影响，翻译了俄国虚无主义者、民粹派代表人物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家庭的戏剧》，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普宁与巴布林》、《木木》和《散文诗》。巴金还翻译过斯捷普尼亚克的创作，反映俄国虚无主义者斗争的短篇小说集《地底下的俄罗斯》。虽然新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涌动着解放的潮流，巴金顺应这一潮流，歌颂人的解放，讴歌少男少女的恋情；但是，我们却在巴金的思想的深层看到禁欲主义的痕迹，这源于俄国虚无主义的影响。在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杜大心有过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也常常怀念去世

的慈母，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使他从对自我的幸福的关心中惊醒，抛弃了学业，拒绝了李静淑的爱情，走上暴力反抗社会的道路。杜大心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放弃一切与物质和感性有关的东西。他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克制自己对李静淑与日俱增的感情。就像禁欲主义者用磨难净化灵魂一样，杜大心珍爱他的痛苦，他要用“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的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把禁欲主义与反抗现实，解放人类联系在一起虚无主义的思想在杜大心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新生》中，李冷梦见母亲对他说：“我们并不是来领受，是来给予的。我们自己也许永远得不到爱，但是我们必须把爱给予别人。我们可以贡献一切的牺牲，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爱来改革这无爱的世界，使那一生都领受不到爱的人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这段关于爱的宣言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自由的宣言何其相似！在《海的梦》中，女主人公抛弃了家庭，拒绝了父爱，把自己献给事业，“又从事业那里得到了丰富的生命”。事实是，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身上都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的影响。这从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心社意趣书》中就能看出来。巴金说他从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身上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自我牺牲，把他称为“我的第三个先生”。1936年他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辩护说：“（中国的安那其们）只是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的工作。”⁹他说自己的生活中只有信仰和为信仰工作的激情，“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称为自己的东西”。¹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都看重生命的安逸与福乐，只有被主流文化淘汰的墨家思想才注重痛苦对生命的磨练。巴金作品里表现出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基督精神的影响。

第三节 爱与平等

巴金曾说，爱是他“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¹¹。“我们的时代的青年的热望，不也就是——爱那被虐待受侮辱的同胞，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斗吗？”¹²博爱，是基督教弘扬的伦理信条，也是巴金的追求。“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产生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¹³从他早期的作品，到八十年代的《随想录》，巴金的作

品中始终贯穿着博爱的红线。《爱情三部曲》中热血青年的牺牲是出于对整个社会中平等互爱的追求，《激流三部曲》中，巴金面对被畸形旧制度吞噬的年轻的生命的生命，愤怒的呼喊“我控诉”。以异域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复仇》充满了“人类的痛苦的呼吁”¹⁴。《寒夜》中巴金通过抗战时期国统区小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呼唤温暖，《怀念萧珊》里巴金低低倾诉的不只是对妻子爱的忏悔，更有在风雨飘摇之中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的无限感伤。这种深沉的人类之爱成为巴金各时期作品的共同特征。我们将探寻一下这种爱的源头。

当巴金还是显赫大家庭中的小少爷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爱一切的人”。巴金深爱着这位母亲，把她称作自己的“第一个先生”¹⁵。我们可以在《新生》的后半部，李冷之母给李冷的信和向他托梦的细节中，隐约看到这位充满爱心的女性的面影。巴金幼时母亲曾与英国女教士往来，她们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根据巴金的回忆性文章，我们认为，无论巴金在四川时是否读到过《圣经》，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已有了博爱精神的思想萌芽。

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从伦理学意义上对基督教进行了考察。他把基督教的根本特征总结为四点。

“(1) 提倡对被压迫者之爱；(2) 以社会的幸福作为人生之中心原理；(3) 主张人人平等；(4) 主张对危害的宽恕。”这些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在《告青年》中，克鲁泡特金揭露私有制的罪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吃人的社会现象，要求青年们去同情穷苦人，怜悯被压迫者，在《面包与自由》中，克鲁泡特金号召人们建设一个“可以给万人带来安乐”，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巴金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一文中这样描绘：“你要吃，就有机关拿饭给你；你要穿，就有衣服给你；你要用就有房子给你。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慧的分别。”而在《火》第三部《田惠世》中，巴金借田惠世之口，说《启示录》中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与“非宗教者的社会理想吻合”：

……在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头上带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坐在云彩上的便把镰刀扔到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上帝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里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了平等和博爱的主题。

巴金曾留学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对他思想和人格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不少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提到过卢梭，还在回忆性散文中借托尔斯泰的话称他为“全世界人类的良心”。他在晚年的《随想录》中写到：“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纵观卢梭一生，尽管他改信过旧教，又皈依过新教，他的宗教意识始终很强烈。他认为无神论者之所以不造成流血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而是由于对善恶漠不关心。而宗教的狂信尽管容易导致流血和残酷行为，但如果正确引导就会产生崇高的品德。这种对宗教的褒扬并不指天主教会：“它只宣传奴隶和依靠，它的精神对暴君的统治非常有利。”¹⁶卢梭不无骄傲地说：“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处处都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究《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¹⁷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延续。他企图消灭人类因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而带来的不平等，并通过契约的形式，把这种新的平等固定下来，使人类都过幸福的生活。并且，卢梭所希望用一种善良和虔诚的感情作为宗教的基础，指引道德和宗教的方向。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把“人类的宗教”作为保持社会契约的有效形式：“由于这种神圣的，崇高的和真正的宗教，作为同一个上帝的女儿的人类也就认识到大家都是兄弟，而且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社会是至死也不会解体的。”¹⁸并且，这种宗教“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它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真正的有神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的神圣宗教。”¹⁹不难看出，借宗教情绪挽救邪恶的现实，建立良好的道德王国，是卢梭推崇宗教的根本原因。他剥离了基督教的神学特征强调了它的人本意义，把宗教作为最高的道德律令以达到使社会人人自由平等的目的。

在《田惠世》中，巴金以它的亡友林憾庐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充满爱心，慈祥的老人田惠世。巴金本想在书中驳倒主人公的

说教，结果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同他的合流了”。田惠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就是卢梭的所谓“人类的宗教”：“他在心里否定了父亲所信的教义，他更不重视礼拜和祷告以及一切近乎荒诞的传说。他和许多非宗教者做了朋友，可是他没有放弃诵读福音书的习惯，他认为这是同‘主’晤谈。”²⁰田惠世“抓住的只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爱’字”，他爱家庭，爱事业，最重要的是爱国家，“全部时间用来助人，爱人，尤其是爱穷人”²¹。他热心公益事业，为贫苦人慷慨解囊毫不吝惜，以致开了顾客盈门的药店却入不敷出，他办《北辰》杂志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像照顾孩子一样关爱它的成长。对他来说，“爱使生命繁荣；失去了它，生命就得枯萎”。²²巴金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一个基督徒的描写，又通过他与冯文淑的对话，力图写出信教者与非信教者基于爱的沟通；正是因为爱才使田惠世这个虔诚的信徒与冯文淑等青年在救亡图存之际携起手来。

巴金的爱的哲学是与平等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卢梭为自由和平等而建立起一种社会契约，无政府主义提倡个人绝对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而在基督教中人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克鲁泡特金谈到基督教的平等原则时说：“在基督看来，一个奴隶和一个自由的罗马公民是平等的弟兄，都是上帝的子女。基督教导人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²³孔子虽然讲“仁者，爱人”²⁴，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²⁵，但又讲“克己复礼为仁”²⁶。“礼”是别异的，因而儒家是爱有差等的。不仅爱父母与爱别人差异甚大，而且在君主与臣民，君子与小人，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墨子提倡“兼爱”，孟子就说墨子是“无君无父”的“禽兽”，就是爱有差等的明证。而巴金呼唤人人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他的人类之爱就必然是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爱，而不是传统文化那种有等级差别的爱了。

巴金写作《激流三部曲》的时候，正是他反抗传统最激烈的时候。大哥的自杀，中断了巴金与大家庭的最后一点联系，他笔下的高家成为传统势力的缩影。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实际上是专制的王国。在和平的表面下隐藏着仇恨的倾轧和斗争，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囚牢里挣扎以致死亡。高家老一辈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千方百计扼杀青年人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

“从来是这样，以后也将永远是这样”就是高老太爷之流的见解。在婚姻大事上，“当事人反而作了不能过问的傀儡，而且从前做过傀儡的人如今又来使别人做傀儡了。”²⁷他们可以随意安排女

性的命运，梅，瑞钰，蕙等美丽善良的女性就因此葬送了性命。至于鸣凤，婉儿等奴婢，更可以随意欺凌，象物品一样赠送他人。高老太爷和克安、克定们并不是有意要虐待哪个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觉新大婚，高老太爷十分高兴，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给孙子带来的痛苦。他爱孙子孙媳，相信自己有权支配他们。他把丫头送给冯乐山也不是有意要害她们，只是认为自己比她们高贵，对她们理应有支配权。高家的生活就是巴金自己家庭的写照。他这样回忆祖父的死：“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卫道者那样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²⁸

• 年轻的灵魂不相信上天和命运。巴金以争取自由幸福为要义，就是要达到人人平等，摆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束缚。他还借用屠格涅夫的话说：“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三少爷觉慧与婢女鸣凤真心相爱，鸣凤被逼投水自尽后，觉慧发出了欲哭无泪的忏悔。觉民、觉慧作为家族中的晚辈，在年节时按礼向祖宗牌位和长辈们磕头，但当长辈们凶相毕露，摆出架势要吃人的时候，总是他们首先想到反抗，最后俩人都成了家庭的叛逆者，他们恨的是旧道德。奉行作揖主义的觉新则容忍了传统伦理的暴虐，既害了别人也葬送了自己。在讲述青年的悲剧命运的同时，巴金通过觉慧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错误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²⁹巴金一方面揭露旧道德之下伦理制度的虚伪冷漠，一方面呼唤青年们打破枷锁，追求平等与互爱。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传统伦理等级制度进行揭露和控诉是作家的当然使命。从《灭亡》、《新生》到《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巴金都希望用平等的原则代替虚伪的等级制度。他的这种爱和平等的观念的出发点，则是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这两者都涉及到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精神。正如基督教的博爱是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一样，巴金的爱的哲学也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基础上，有爱心之人也必平等待人。爱与平等构成了巴金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

第四节 罪感与忏悔

忏悔是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基督徒向上帝赎罪的

一种形式。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忏悔已成为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不断自我反省、净化灵魂的方式。卢梭曾在《忏悔录》中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会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的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的写了出来。’”16岁到24岁他寄居华伦夫人，即使在这个他认为是一生最幸福的时期，他也受到原罪和救赎问题的纠缠，怀疑自己死后的命运。事实上，忏悔是卢梭在西方文化转型期对基督教遗产的继承和弘扬。当法国的启蒙哲学家忘记宗教的终极关怀和救赎传统，在理性的旗帜下大声斥责宗教时，卢梭用忏悔意识把宗教情怀引入世俗的道德实践，使宗教意义上的忏悔变为对人的现实行为和精神世界的反思。

巴金的罪感意识更多源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思想。民粹主义思想从卢梭那里就萌芽了，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日内瓦共和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以自己是“日内瓦共和国”的公民而自豪。卢梭民粹思想被俄国知识分子接受，并与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东正教精神混合了起来，使民粹主义成为十九世纪俄罗斯富有民族代表性的革命思潮。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几乎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罗斯革命家——斯捷普尼亚克在《地底下的俄罗斯》中说到的新虚无主义者就指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相信，在人民——主要是农民——中保存着真正的生活意义，俄罗斯的灵魂隐在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赫尔岑在农村公社中看到了蕴含的个性与社会性，普遍性原则合理共处的可能。巴库宁相信真理潜藏在劳动人民中间，在最贫困的群众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民中藏有俄罗斯宗教的真谛。民粹主义者感到知识分子与人民是脱离的，他们在人民面前永远负债。有教养的上层人的罪孽在于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建立在对劳动人民剥削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应该偿还这个债务。民粹主义者拉甫洛夫的《历史的信札》成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手册。这本书出于在人民面前知识分子有罪并必须为这个阶层向人民赎罪的道德动机，——在自己的特权范围中体验强烈的忏悔动机。忏悔贵族的形象被创造了出来，它是识别自己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罪孽，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罪孽并在内心忏悔。东正教宣扬的忏悔意识在另一个层次上凸现了出来，向人民而不是上帝，或人民即上帝，进行忏悔。这种忏悔意

识在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列夫·托尔斯泰是巴金接触比较早也非常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巴金发表的第一篇与外国文学家有关的文章是1922年的《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早期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性文章，也引用过托尔斯泰关于爱国主义和自由的论述。借用他的名言：“自由非赠品，自由有代价，曰血与泪”，鼓励无政府主义者的斗志。30年代为反击文坛对托尔斯泰的污蔑，巴金翻译了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从短篇《一粒麦子有鸡蛋那么大》、《一个地主的早晨》到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巴金都读过。他说自己是“流着泪”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复活》。巴金引用高德曼的话说：“托尔斯泰把把人类关系之概念基础在《福音书》之新的解释上面，然而他和现在的基督教是离的很远很远的。”³⁰而勃兰克斯则说：“现今只有两个伟大的俄国人时时想着俄国民众，而他们的思想又属于人类全体。这两个人便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彼得·克鲁泡特金。”³¹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他的宗教就是他的道德。他反对政府、暴力、文明要求人听命于生活的主宰——上帝——的旨意。他同情农民的不幸处境，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为贵族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恼。这些问题在东正教道德强调的博爱、宽恕和忏悔中都被解决了。《一个地主的早晨》中聂赫留朵夫在自己的庄园中经历了改革的失败。《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在做出同样的挣扎后皈依了上帝。《复活》书名本身就表达了东正教反复阐述的拯救、复活、升华的主题，卷首还引用了《马太福音》中的四段话，聂赫留朵夫成为忏悔贵族的代名词。

从高德曼给巴金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巴金从少年时就为自己出身于黑暗社会中富裕的大家庭感到苦恼和羞愧，认为上等人是有罪的，自己应该赎罪。他后来也说：“我们的长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³²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忏悔意识——这也是所有民粹主义者的忏悔意识——非常容易得到巴金的认同和接受。《灭亡》中李冷兄妹立誓献身的一瞬，正是巴金的写照：“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家》中觉慧对鸣凤的忏悔与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悔罪就有相似之处。

除了卢梭和托尔斯泰，巴金的思想与创作也受到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影响。他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译过《罪与罚》第二章。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在巴金的创作中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他民粹主义者的身份、对爱的宣扬和忏悔意识却给巴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无论是圣奥古斯丁，还是卢梭、托尔斯泰，他们向上帝忏悔都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但是，忏悔又让他们的心灵骚动不安，陷入种种矛盾中。巴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³³他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话的人是有福了。……但是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³⁴他的一生充满了“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³⁵，在两者必选其一之后，留下的是心灵的忏悔。《生之忏悔》只是他“忏悔录的一部分”³⁶，从早年的创作到晚年的《随想录》，巴金几乎一生都处在忏悔之中。

托尔斯泰从原罪的意义出发，主张宽恕他人和勿以暴力抗恶，而从小生活在基督教氛围中的克鲁泡特金，也对原始基督教的宽恕加以肯定。巴金虽然“学历史上那个伟大的人物那样来诅咒人”：“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³⁷并且，“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人类得救”³⁸。但巴金却又感到：“我常常犯罪了！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的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的老师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³⁹巴金写作《灭亡》，希望大哥读后明白他的理想与志向，但他的兄长最终也没有读到这本书。被巴金称为“吾师”的凡宰特，怀着宽恕之心宣传无政府主义。巴金在他被处以极刑之前收到他给自己的信，却没有机会与他辩论宽恕的软弱和无力。巴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难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那些曾经给予自己关怀和影响的人，但自己选择的道路又与他们的思想相背，也许他能通过这种忏悔缓和内心的矛盾与不安。

文学创作虽然给巴金带来了成功，但他更希望能够像其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谈到自己的文章，他痛苦地说：“话语并没有力量，我不知道我以后有没有用行动表现自己的日子，倘使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一生，也许是完全白费了。”⁴⁰这些忏悔是巴金对那些领他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的革命者而发的。正是高德曼、凡宰特回答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异国青

年的来信，安慰了巴金的痛苦，改变了巴金的人生道路。巴金也曾发誓“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⁴¹，但“他的生性忧郁，他的纳于言，慎于行的个性都使他无法投身到实际的运动中去。”⁴²于是巴金留下了深深的忏悔：“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了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⁴³“只要我能够回到生活里去，我决不再走从前的路了。我要忠实地去生活，去受苦，去拿行动来爱人，来帮助人，不再拿纸笔浪费我青年的生命。”⁴⁴“这种矛盾与痛苦，贯穿了巴金的前半生。直到巴金醒悟到“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幻梦”⁴⁵时，才终于选择了文学之路：“我愿意他们广泛的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的憎恨。”⁴⁶

这种不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忏悔充斥了巴金的前半生，当他进入暮年时，真诚的忏悔又一次充斥了他的心灵，这就是《随想录》。《随想录》中有对国民性的反思，更有沉甸甸的自我忏悔与赎罪意识：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
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
运。……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反
思”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
持了个人的清白。

——《解剖自己》

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十年一梦》

巴金是文革结束之后，较早地对其进行深刻反思的现代作家之一。更可贵的是这种反思并不在于指责他人，而在于反思自己——虽然自己在文革中历尽磨难，但自己同样是文革的促成者。正是这种由己及人的精神弱点在文革中推波助澜，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痛苦。他在《怀念萧珊》中说：“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无论是从亲情的角度忏悔，从人类弱点的角度忏悔，还是为了家族的罪恶忏悔，为了没有实践自己的信仰忏悔，巴金都希望通过忏悔摆脱心灵的痛苦，得到一点灵魂的安慰。不过，巴金的忏悔又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所不同。托尔斯泰一方面同情农民的不幸处境，一方面为贵族阶级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而苦恼。聂赫留朵夫真诚地悔罪，他从宗教中得到启示，按照上帝

的意志为人类工作，从而在精神上得到复活，这是托尔斯泰为俄国贵族找到的出路，这种忏悔并不指向对社会反抗。觉慧的悔罪则与传统的道德良心结合在一起，是他觉醒和反抗现实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疯狂的意味。在陀氏笔下，人天生受恶的支配，是情欲的奴隶，人的犯罪和忏悔都是必然的，无法用理性遏止。巴金的忏悔则在情感和理性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五节 信仰与牺牲

基督教信仰具有强烈的迷狂性。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能与对上帝始终不渝的信仰相匹敌。耶稣告诫众人：“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⁴⁷信仰可以给人以力量。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有足够的信心，没有不能做的事。便是叫一座山从这边挪到那边，山也必遵命不误。”⁴⁸信仰甚至可以给人永生，“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死了，必也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⁴⁹而且，牺牲成为对信仰最重要的考验。耶稣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难于十字架，他的复活则使人坚定了他所传播的信仰。因此，耶稣无疑是西方世界中一位人所敬仰的为信仰而殉道的文化原型。

巴金对基督教信仰与牺牲关系的认同，既有耶稣基督精神的直接影响，也有无政府主义的中介影响。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巴金一样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的人并不多。巴金从十七岁加入四川无政府主义组织“均社”起，就抱着一种为无政府主义理想献身的态度。他在1926年发表的《一封公开的信》中说：“我是一个愿献身于克鲁泡特金主义，终身为自由、平等、正义和人道奋斗的人。”1928年他在《答诬我者书》中说：“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如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断向前进的，也是我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先驱者们。从八年前我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一直到我将来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衰落，巴金从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行动转向单纯的文学创作，但仍然与无政府主义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政府主义理论性文章写的少了，但仍编译了大量克

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反映俄国虚无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斗争的丛书，如《地底下的俄罗斯》、《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狱中记》、《自由血》、《我的自传》、《克鲁泡特金全集》等。五十年代还再版了反映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反法西斯斗争事迹的作品集《西班牙的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还自己作品全集的序文中谈到“美好的无政府主义梦想”。

巴金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全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为了无政府主义理想抛弃了巨大的家产和公爵的称号，甘愿吃黑面包过逃亡生活。克鲁泡特金在沙皇统治时期几次入狱，苏维埃革命胜利后同样遭到镇压，但东正教的宽恕和自我牺牲使他从未在宣扬自己的信仰时对任何个人进行过诅咒。勃兰兑斯在《克鲁泡特金全集》的英译本序中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复仇心切的人，但始终是一个殉道者。”巴金曾多次重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因为“读克鲁泡特金自传的人也许不相信他的学说，但没有不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动的。”⁵⁰

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他的自传中说，他自幼就不信宗教，缺乏真情实感的东正教仪式使他生厌，《福音书》中关于基督受难的描述却使他感动。克鲁泡特金对伦理道德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人类解放运动需要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最后的著作《伦理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互助、正义、自我牺牲是人的天性。其中，他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基督教的发展，说基督教的力量源于为了社会的幸福而非个人的幸福。原始基督教反映了人类的道德天性：就象耶稣为了把人从邪恶势力中拯救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人随时准备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基督教在宣传自己的同胞中的博爱与互助时，并不曾引进任何新的道德原则。”⁵¹后期教会的伪善使基督教无法履行这种道德作用。显然，克鲁泡特金对基督教的论述是为自己的判断服务的，但不是宗教徒的克鲁泡特金没有摆脱东正教文化的熏陶也是很明显的。互助就是东正教道德观念提出的爱人如己的要求的推衍；为正义自我牺牲的思想则与虚无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一样，是东正教殉道精神的外化。

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行动也影响了巴金对殉道精神的推崇。巴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编辑了大量俄国民粹主义者“用活人的血写成的”的斗争故事。他翻译过《赫尔岑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介绍这两位著名的民粹主义者的生平和文学创作。他曾想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因故没有实现，就请罗淑节译了部分章节，以《何为》为名在自己主办的文化生

活出版社的刊物上发表，还特意为之写了评论。当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很流行，巴金却只字未提，只翻译了他写给流放中十二月党人的一首诗《寄往西伯利亚的音信》，十二月党人都是著名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行动表现出对信仰的无限忠诚，和这种无限忠诚导致的激情和狂热，正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义给俄罗斯文化打下的明显印记。1886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农民陷入万劫不复的惨境。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运动因为过高估计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而失败，狂热的为信仰殉道的精神在民粹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中迅速升温。知识分子在民间不可挽回的失败，使他们意识到“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之邦不得不依靠刀剑的力量”⁵²。俄国知识分子与沙俄政权单打独斗的悲剧开始了。1881年，A·泽里亚波夫因刺杀行动被俘。在审判中，当被问到是否有宗教信仰时，他这样说：“在东正教受过洗，但我否定东正教，尽管我承认耶稣基督的教义本质。这种教义本质在我们的道德宣传中占有至上地位。我相信这个教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为真理，为被压迫者而斗争，如果需要也应该为他们承受苦难。”⁵³

巴金从俄国革命者那里接受的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通过克鲁泡特金对基督教的介绍在耶稣的故事中得到了升华。巴金在《死》中说：“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布鲁诺上火刑柱，……象这样毫不踌躇的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今来能有几人！”而克鲁泡特金这样评价基督：“那个神性的教师对人们（对一切人，不论其民族与社会地位的差别，尤其是对底层人民）的爱导致最高的英雄的牺牲——即为了把人类从邪恶势力中拯救出来而死在十字架上”。克鲁泡特金在它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即《人生哲学》中，把道德归结为三个要素：互助，正义，自我牺牲。巴金对此非常推崇，认为克鲁泡特金本人就是这种道德的实践者。他在《〈我的自传〉·译本代序》中对克鲁泡特金一生为信仰不断奋斗的精神大加赞扬，并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克氏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教的精神的人”。由此可见，为信仰而牺牲自我是巴金接受《圣经》中耶稣形象的出发点。

在《“重进罗马”的精神》中，巴金无疑把耶稣当成了为信仰殉道者的典范。《新生》中的李冷把死描述为“戴上这荆棘的冠昂然地走上牺牲的十字架”，就与《圣经》中对耶稣受难的描述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篇小说以《约翰福音》中的话做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

粒来。”暗示李冷身后有更多如他那样有坚强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的青年。《电》最初发表时分为上下两篇。下篇开始时巴金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四段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在进行西方文学的阅读和译介时，巴金喜欢那些表现出信仰高于一切的主题的书籍和作品，偏爱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英雄。从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高德曼的《狱中记》、廖抗夫的《夜未央》到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他从少年时代就具备了良好的外文功底：13岁开始学习外文，14岁直接通过英文阅读原著，16岁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20岁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开始学习世界语……他曾翻译过英、法、德、俄、日、世界语六种语言的作品。虽然西方文学的大门很早就向巴金敞开了，但是巴金对西方文学的选择一般从属于自己对信仰与牺牲关系的认可。他曾经说：“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的殉道者。”⁵⁴当巴金带着无政府主义信仰和对革命者人格力量的崇敬阅读《圣经》时，基督精神与它们的契合之处显露了出来。剥离了《圣经》的神学面纱，呈现在巴金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坚毅品格和博爱胸怀的人——耶稣。他为了人类利益从天国降到充满着苦难与邪恶的凡间在无边的旷野上奔走传道，最后为了人类的利益勇敢地牺牲在十字架上。在巴金看来，这与革命者特别是民粹主义者为了拯救下层人民，抛弃一切特权阶层的荣耀，在民间组织革命运动，暗杀统治者没有什么两样。“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人类进化的每个时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热血。人类崇拜超时代的先驱者，然而人类又害怕这些先驱者——死了的耶稣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稣总是受人虐待。”⁵⁵斯捷普尼亚克在《地底下的俄罗斯》中称赞他们说：“宁愿抛弃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便走上殉道的路上去了。他们恰如早年的基督徒，以至诚博爱之心，严格的态度和温和的微笑走上了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水同消了。”巴金称赞俄国革命者的牺牲“与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药，实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巴金所认同的信仰和牺牲决不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仁”与“义”是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三节论述过；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儒家定义的“仁”与“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也并不坚定。

孔子虽有“杀身以成仁”⁵⁶、“朝闻道，夕死可矣”⁵⁷等豪言壮语，但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⁵⁸因为他首先关心的是生命的安乐，其次才是“克己复礼”。豪言壮语必须能够灵活变通以“明哲保身”。基督教却提倡宁可折磨、毁损肉体，也要保持灵魂的纯洁和精神的愉悦。就巴金本人来说，他在20年代已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30、4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不占优势了，但巴金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惟有基督教文化才能产生这种坚执。并且，巴金对为信仰而牺牲的人抱有特别的崇拜。他这样评价俄国的虚无党人：“他们富于自己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⁵⁹他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赞美用自己的心灵照彻黑暗的勇士丹柯。他也赞美李大钊：“在法庭上那样慷慨申辩，临死又如此勇敢。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为钦佩。我确实恭敬他象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⁶⁰在这里，巴金对信仰与牺牲的评价已经超越了“主义”的界限和是非的标准。只要是为了信仰坦然牺牲自我的人，在巴金那里就必然会受到称赞。他对于信仰和牺牲两者关系的处理上，与基督教一样，具有了一定的迷狂性。

巴金曾说：“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⁶¹在理论上，巴金深信“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中国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从现实社会一步跨入无政府主义，巴金则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革命发生后，也只能引导社会向着无政府主义理想走去，不是一步便可走到的。”⁶²他还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⁶³这些观点与他对俄国革命者暗杀行为的赞美似乎不协调，他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与罪恶同归于尽。他说：“我自己是反对他（指杜大心）走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的死而哭。”⁶⁴在《电》中巴金明确指出罪恶之源是“整个制度”“不是个人”，然而，敏还是走上了恐怖主义者的暗杀之路。

虽然巴金说《灭亡》中的杜大心与《新生》中的李冷“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国革命家的传记）里来的”⁶⁵，且后半部曾得到不少论者的证明，但所谓“从书本上来的”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可以说这正是巴金所向往的生活，但随着岁月的变迁，“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

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我们不妨这样解释：当巴金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与他写作冷静的政论文相反，他的感情是处于理智之上的。他用他的人物和故事把他在社会中看到的，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及由此产生的心灵的痛苦全部倾诉了出来。当这种创作体验达到高峰时，巴金已不能给笔下的人物找到比为信仰而牺牲自我更好的出路了，自然也就来不及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这种牺牲对于整个斗争过程来说究竟值得不值得。巴金自己也承认：“不仅是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性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⁶⁷使人有足够的勇气为信仰而牺牲一己。巴金曾说：“我只有一个现在，我有一条简单的路，我只有一个单纯的信仰。……只有这信仰是生了根的，我永远不能把它去掉或者改变，甚至在我忘了自己忘了过去的时候，这信仰还象太白星那样闪烁光芒，……把梦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的就只有信仰”。“可以说《爱情的三部曲》就是巴金“梦的世界”。“他常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对待的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同现实严格的区分开来。”⁶⁸

第六节 世界主义与民族情绪

基督教“因信称义”，不论人的种族、国家、贫富，只要信仰上帝就会得到他的怜恤，与其他教徒是兄弟姐妹。博爱的对象是所有信教的人。《马太福音》中记载，有一次耶稣正在对众人讲道，有人告诉他母亲与兄弟来了，耶稣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无政府主义是提倡世界主义的。克鲁泡特金在《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卷首引用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伯的话说：“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自己，只有在一个大的星球上对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我。”巴金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中说：“无政府主义表明了一个原理，就是：全世界生物和人类都具有团结的感情，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他与托尔斯泰一样反对盲目爱国主义，反对政府借爱国之名侵略世界同胞。巴金在《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中指出：“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本来全世界的民众是应该互相亲爱，联合一致的。”基于这种理想，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巴

金就翻译了不少世界语作品，他提倡学习世界语：“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眼前。”

在文学创作上，巴金躬身实践着罗曼·罗兰的创作思想：“民族太小了，全人类才是我们的题目。”他最喜爱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信。托尔斯泰在信中说：“只有沟通人类的同感，去除人类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只有为了坚定的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家。”巴金写过许多异国情调的小说，为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被战争夺去爱子的法国老妇，为爱情所苦恼的贫穷的意大利乐师，抛弃富贵荣华走上革命道路的俄罗斯少女……都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他自己也承认，受欧美文学影响，在创作初期常按英文文法遣词造句。更值得注意的是，巴金许多作品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规范。传统的审美观推崇宁静祥和、空廓辽远的审美氛围。巴金早期的小说在情节刻画上则是动态的、紧张的，甚至有恐怖的审丑倾向。《复仇》中的福尔蒙席太因杀掉仇人，“吃掉刀上的血”；《雨》中陈真想象自己死后身体腐烂，爬满了蛆虫；《灭亡》中革命者的头被砍下来吊在竹笼里滴着臭水，《寒夜》中汪文宣垂死的挣扎……直到《激流三部曲》，我们才可以在人物刻画上发现一点《红楼梦》的影响。走出传统的文艺观，与世界文学的发展道路接轨，更有助于表达人类的共同感情和生存状态。

从基督教的影响看，克鲁泡特金设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万人安乐”的理想世界具有 19 世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启示录的性质。而巴金曾在《爱情的三部曲》之《电》的初版序言和《火》的第三部《田惠世》中借《启示录》对美好社会的描述表达了众生欢乐，消除痛苦的社会理想，《启示录》中以象征语言描绘的世界末日与美好天国，被巴金拉到人间。“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人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使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⁷⁰

世界主义与民族情绪并不矛盾。耶稣强调的“天国”是上帝的统治，不是要建立基督教性质的国家。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和天国，教义中的博爱都是世界主义的，但耶稣也有民族感情，他曾预言过耶路撒冷被毁，自己要为他哀哭。俄罗斯革命者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屠格涅夫《俄罗斯的语言》赞美了引以自豪的母语。用基督教的精神和故事激发民族情绪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有很多，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就是代表。巴金也用彼得重进罗马的故事激励国人的抗日决心。《海的梦》中世界主义与民

族情绪都有所反映。这部中篇写了一个犹太女郎渴望建立自由王国的故事。她的国家中奴隶受到二重压迫：酋长、贵族，高等人物和高国的军队。犹太女郎身上有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影子。她抛弃贵族身份来到奴隶中间帮助他们建立自由王国，信仰与爱情，信仰与亲情的冲突苦恼着她，革命高潮时她受着奴隶们的爱戴，失败后却遭他们的冷淡，有人说巴金把她写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基督”，巴金本人也承认了。这篇小说不是直接描述抗日的小说，但对高国军队的描写却是以日本侵略为原型，巴金把自己在敌占区耳闻目睹的情况和自己的愤怒都写了进去。犹太女郎对高国军队的仇视和对自由幸福国度的向往既反映出巴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反映出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结 语

巴金不是基督徒。他的宗教观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一直与基督教保持着距离。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无神论者。巴枯宁甚至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也要把他消灭掉”⁷¹。克鲁泡特金在自传中说，他自幼不相信基督教，缺乏真情实感的东正教仪式使他感到厌恶。不少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阐明无政府主义大义的同时明确反对宗教。在无政府主义的解释中，宗教带来的迷信与科学主义相背，“科学者，进化之利器也；迷信者，思想之桎梏也。”⁷²宗教神权思想与专制相连，“彼耶稣教徒之主张，唯上帝而已，呜呼！上帝者不过欲使人服从，乃强权者之用以欺侮人压制人者也。”⁷³巴金“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怀着一颗不惧怕一切的心，离开那从空虚里生出来的鬼和神而存在。”《神、鬼、人》中有这样的对话：“年轻人，你是什么？你敢毁谤神？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人。”在《神》和《鬼》中主人公吃斋念佛逃避社会、家庭的压力，却无法使自己摆脱心灵的痛苦。巴金回忆主人公的生活原型武田先生到自己的房间念经驱鬼，他差点笑出声来。在《火》第三部中他安排冯文淑与田惠世屡次进行关于基督教的辩论，每一次的结局都是田惠世无话可说。这位坚信上帝的老人痛失爱子世清后，他对“主”的信心和希望渐渐朦胧。他感到上帝离弃了自己，愤懑的呼唤：“还我世清来！”对于田惠世的生活原型——林憾庐，巴金佩服他的人品和敬业精神，并不赞成他的宗教信仰。在《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中，巴金号召中国人推翻三种制度以获得幸福：政府、私产、宗教。巴金还猛烈抨击了基督教束缚人

群思想，阻碍人类进化，给人类带来保守和迷信，给上层阶级剥削人民提供借口。在《火》第三部中，冯文淑大段引用小说《沙宁》中的话批评基督教“和善、谦卑，并且给人许多未来的幸福，它反对斗争，说着永久幸福的幻影，把人类催入甜蜜的睡眠，……还有，它将生命的重心转移到未来，到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因此一切生命的俊美都消失了；勇敢，热情，美丽，一切都死亡了；只有一个责任存在着，还有一个便是一个未来的黄金时代的梦。……”四十年代巴金在与赖治恩神甫关于中国人道德生活的论战中，清楚的指出了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堕落和对异端的残酷压迫，指出建立基督教的信仰无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

虽然巴金在文章中否定、抨击基督教，但基督教文化仍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对巴金的思想 and 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中的禁欲主义，爱与平等，忏悔意识，信仰与牺牲和世界主义精神的确在巴金的思想 and 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尽管巴金本人对基督教的影响提及不多，但是，如果能把握到巴金与基督教的内在联系，那么巴金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我们也看到，正如基督教在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里产生的影响一样，基督教对巴金的影响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国外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也都反对宗教，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了巴金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看取。他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接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时，巴金14岁。他记得兄弟姐妹们买来《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如饥似渴的阅读。巴金后来回忆说“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⁷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重估的革命，知识分子感到要救民救国，必须推翻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寻求一种新的能够拯救苦难民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他们对于新的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存在着分歧，但在打倒旧的传统上是绝对一致的。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就在于给所有现代青年反抗传统树立了榜样：“一切旧的，不合理的，都是应当毁灭的，一切新的，合理的，都会建立起来。”⁷⁵就像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后，巴金抱着这个信心选择了无政府主义一样，他对基督教精神的认同也源于这种重建价值体系的愿望。

孙景尧在《比较文学》中《文学与宗教》一章中指出：中西方“宗教”一词的涵义并非完全一致。西方的宗教一词，蕴涵着

上帝同人类的绝对二分。真理在上帝手中并绝对超越世人，人永远只能被动的靠上帝，靠耶稣拯救自己。religion的核心意蕴就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中国宗教一词的本义则指一种教育行为，与中国古代推崇教化是合拍的。中国对宗教的传统认识，也是从现世伦理教化功能的作用出发来认定它的。我们认为，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对宗教采取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认同同样如此。据历史记载，作为一种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对华传播从唐太宗贞观九年就开始了。后又经元、明末清初共三次传教，均未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督教宣扬的伦理观念——唯信仰是从，博爱，原罪与救赎一直不为中国传统道德所容纳。这个现象在佛教的传播中也出现过，但佛教由出世观念向入世观念的转变，至宋明理学逐步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而基督教在1840年之后大规模向中国传人之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感于内忧外患，对传统伦理价值产生怀疑，乃至力图颠覆之时。面对经过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日渐衰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把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推翻后，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体系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来补充道德价值的空白，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基督教就不可避免的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少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倡导汲取基督教的思想拯救民族的命运。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充满热情地说：“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尽管如此，这种传教与前三次迥然不同：不是以文化交流而是以文化侵略的方式进入中国。鲁迅说中国百姓信教者少，吃教者多，就是这种文化侵略在民间造成的恶劣影响。从宗教传播角度看，基督教这种带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传播，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丧权辱国的耻辱印记，在心理上很难接受。所以中国现代作家在看取基督教时往往将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伦理价值和神学教义截然分开。陈独秀在1918年的《偶像破坏论》中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耶和華上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但在伦理取向上，陈独秀又充满热情的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籍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

力图把基督教的文化精神和宗教归化区分开，这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看取基督教的复杂心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

直延续到当代，巴金也不例外。巴金爱与平等的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对立，个性解放与家族主义相对立，他没有接受基督教中与爱相关的宽恕和忍耐，反而“为了爱去宣传憎恨和复仇”。对爱与平等的呼唤使他推崇个性解放，而执着的献身精神又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禁欲主义因素。他的忏悔与赎罪意识也不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巴金的赎罪意识经常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良心相结合，变而成为一种自我解剖和自我反省的精神。即使他对信仰和牺牲的礼赞，也与基督教文化略有不同。巴金在散文《生》里写道：“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我爱生，所以我愿意象一个狂信者那样投入到生命的海洋里。”⁷⁶这种狂信看起来是基督教式的，但由于巴金将“神”置换成了“民族”，就变成了一种执着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了。

注释：

- 1 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155页，文风出版社1950年
- 2 同1
- 3 《忆·家庭的环境》，《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 《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5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54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
- 6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77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
- 7 《我的幼年》，《巴金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8 《我的幼年》，《巴金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9 《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巴金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10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巴金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 11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巴金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 12 《点滴·过年》，《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13 《生之忏悔·我的自剖》，《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14 《复仇·序》，《巴金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 15 《短简·我的几个先生》，《巴金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16 罗曼·罗兰《卢梭和他的著作》10页，三联出版社1996年
- 17 罗曼·罗兰《卢梭和他的著作》11页，三联出版社1996年
- 18 卢梭《社会契约论》179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 19 卢梭《社会契约论》77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 20 《火·第三部》《巴金全集》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21 同20
- 22 同20
- 23 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文全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24 《论语·颜渊》

- 25 《论语·雍也》
- 26 《论语·颜渊》
- 27 《家》，《巴金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 28 《忆·家庭的环境》，《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29 《家》，《巴金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 30 《生之忏悔·〈黑暗之势力〉之考察》，《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1 《〈我的自传〉英文本序》，《巴金译文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2 《巴金选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 33 《海行杂记·两封信》，《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4 《点滴·生命》，《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5 《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36 《生之忏悔·前记》，《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7 《光明·序》，《巴金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8 《海行杂记·耶稣和他的门徒》，《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39 《灭亡·序》，《巴金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0 《忆·我离了北平》，《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 41 《断头台上·第二部·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42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3 《将军·序一》，《巴金全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4 《光明·最后的审判》，《巴金全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5 《忆·信仰与活动》，《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6 《电稿·代序》，《巴金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47 《马太福音》23章1节
- 48 《马太福音》10章2节
- 49 《约翰福音》11章2节
- 50 《我的自传·译者后记》，《巴金译文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51 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文全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52 斯捷普尼亚克《地底下的俄罗斯》，《巴金译文全集》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 53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67页 邱运华 吴学金译 东方出版社1998年
- 54 《断头台上》，《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55 《自由血》，《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56 《论语·卫灵公》
- 57 《论语·里仁》
- 58 《论语·泰伯》
- 59 《断头台上·第二部·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0 《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巴金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1 《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2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巴金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3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4 《生之忏悔·〈灭亡〉作者的自白》，《巴金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65 《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巴金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6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67 《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68 《梦与醉·梦》，《巴金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 69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29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 70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巴金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71 《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巴金全集》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72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34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73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6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74 《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巴金全集》2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75 同 74
76 《梦与醉·生》，《巴金全集》1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参 考 文 献:

- 《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法国 明兴礼著 王继文译 文风出版社 1950 年
《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马佳著 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旷野的呼唤——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宗教文化》杨剑龙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译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研究资料》李存光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忏悔录》 法国 卢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巴金论稿》陈思和 李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社会契约论》 法国 卢梭著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卢梭和他的著作》 法国 罗曼·罗兰著 王子野译 三联出版社 1996 年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尼亚别尔嘉耶夫著 邱运华 吴学金译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张达明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 高旭东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 1987 年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论语》
《圣经》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鲁迅与表现主义》 山东社会科学 2000 年第三期
《巴金与基督教》 中国比较文学 2000 年秋季号

致 谢

巴金与基督教是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重点钻研的课题，在导师高旭东教授的指导下，写成《巴金与基督教》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秋季号上。写作毕业论文期间，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进一步地研究，产生了不少新思想，写成上面的毕业论文。感谢三年来高旭东教授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感谢他为论文的修改付出的心血。

2001年4月